

藝術經典

# 魏晉書風

魏晉南北朝書法史札記

◎ 劉濤 著 ◎

羲之於世  
安以善書  
果為結力  
不次王  
羲之於世  
安以善書  
果為結力  
不次王

山陰張侯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 魏晋书风

刘涛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 / 刘涛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18-13409-3


I. ①魏… II. ①刘… III. ①汉字—书法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9 ) 第045123号

WEI JIN SHUFENG: WEI JIN NAN-BEI CHAO SHUFASHI ZHAJI

魏 晋 书 风： 魏 晋 南 北 朝 书 法 史 札 记

刘 涛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肖风华

主 编：李怀宇

责任编辑：李展鹏 张 静

封面设计：张绮华

内文设计：奔流文化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6 字 数：150千

版 次：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80685

## 目 录

引 言	1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001
曹魏五家	005
韦诞题榜	011
被遗忘的吴国书法家	016
卫瓘“草稿”的地位	023
王羲之评论汉魏两晋书家	027
右军之师：卫夫人与王廙	032
“逸少有名之迹”	035
“正书第一”《乐毅论》	040
《兰亭》“故事”的两种文本	048
《兰亭序》稿本之议	051
王羲之书法的分期	056
王献之拒绝题榜	062
“今体”与“破体”	067
三国两晋时期的名刺格式与书法	070

东晋《张镇墓志》与《张苍梧碑》	075
东晋高崧夫妇墓志的书体	077
模仿高手也名家	081
读《爨宝子碑》	084
刘宋《晋丰县口熊造像记》	088
吴郡张氏：江南的书法世家	090
梁武帝“干预”书法	096
南朝崛起的寒门书家	100
南朝“杂体”	105
南朝书学新词	109
南朝的书法鉴定	118
鲜卑汉化与北魏书法之变	122
北魏太武帝仆倒《峰山刻石》	130
崔亮那些事	135
汉魏石经的刻立、毁坏与迁徙	138
山东境内的北齐大字摩崖刻经	144
北齐书僧“僧安道壹”	147
南北朝“铭石书”的隶楷之变	152
南北朝的“侍书”	156
南北朝碑志上的书家署名	158
抄书、佣书及书家	164
魏晋南朝女书家	169
正体字	174
题 壁	176
书坛的领袖与偶像	181

# 引言

书法史上，书体的演进，带来正体字的转换，书风有过两次大变化。

第一次发生在汉朝，隶书取代小篆的正体地位，文字书写从“古文字”时代跨进“今文字”的隶书时代。

通行隶书的汉朝，隶书由古隶发展为八分隶书，速写体的草书建立规则形成了章草，这两种书体都在东汉中后期达到鼎盛。隶书时代，简约的小篆仍有一席之地，却是特殊场合露峥嵘。东汉后期，从隶书的俗写体衍生出行书和楷书，为下一个文字书写时代拉开序幕。

第二次书风之变在魏晋，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进入楷书时代。魏晋两百年间，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这就是魏晋新书风。

魏晋书风之新，是新书体的兴起和流行。

楷书、行书是汉末出现的书体，魏晋时自是新书体，并且很快盛行起来。早期楷书、行书还带有结构平正之类的隶书遗意，经过魏晋几代书家的书写实践，尤其是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的加工整理，新书体成熟了，并在王羲之笔下形成“斜划紧结”的“今妍”面貌。

魏晋时期，草书仍是时兴的书体，但面貌发生了改观，先是从章草的俗写体演变为西晋卫瓘那样流便的“草稿”，而后王羲之完成了章草的革新，写出了笔势纵引的“今草”。

魏晋书风之新，也有技法之新。

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书写技法，与篆书、隶书明显不同。经过王羲之的革新，这三种书体都形成了“今妍”的新面貌。形态的新面貌，自有相应的新技法。例如，用笔简易，一搨直下，俯仰向背，结字的欹侧，避就朝揖，等等。尤其是书写行书、草书，用笔连贯，映带牵连，笔势纵引，笔锋的正锋、侧锋、偏锋随着笔势自然转换，变化多端。新的技法，存有多种发挥的可能性，为书写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魏晋书风之新，还有文字书写的载体之新。

新书体兴盛的魏晋时期，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宽幅的纸张取代了狭长的竹木简牍，进入写本时代。在柔软的纸上写字，运笔的摩擦感不同于竹木简牍，书写更加流利，便于充分发挥毛笔“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写功能。

纸张的幅面比简牍宽得多，可以连续书写十数行文字，也就便于书家发挥连属的笔势，不但使书家带来书写的新感觉，也为观赏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魏晋之后进入南北朝，分裂是这段历史的特征。然而，早在4世纪前期，南方是东晋，北方是十六国，已是裂土而治，南北书风也形成了分野：南方“今妍”，北方“古质”。

南北朝的一百七十年间，新书风的主流在南方。5世纪末，北朝看齐南朝文化，书法汇入江左相传的新书风。

魏晋时代，书家荟萃。当时书家推崇的书家，亦即书家中的书家，前有汉末的张芝、魏国的钟繇，后有东晋“二王”父子。从魏晋的角度看，杰出代表是钟繇和王羲之，人称“钟王”。但是，将楷、行、草书全面推向“今妍”之境的书家是王羲之。他是魏晋书风的受益者，也是新体书法的完成者、集大成者，人称“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

今天，成为中国书法的著名符号。

魏晋书风在书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也是划时代的一页。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

##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书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大书家蔡邕那里。唐朝张怀瓘《书断·中·韦诞传》记载：“蔡邕自矜能书，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

蔡邕是书家，也是学者，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擅长碑铭这种文体。东汉立碑颂德的风气极盛，许多名士的碑铭都是聘他撰文。蔡邕还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间，他和几位大臣联名上书，要求订正儒家经典，刻立石经碑，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经碑，共四十六通，立于洛阳太学，后人称为《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书丹，当时“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百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及李贤注引《洛阳记》）。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亦可摹写标准的隶书。《熹平石经》并非蔡邕一人书丹，他的书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说蔡邕书碑。

东汉草书家张芝与蔡邕是同时人，都生活在东汉中后期，也自矜能书。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针对任何人，而张芝则是针对当时另外两位草书家而发，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

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罗叔景、赵元嗣就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罗晖、赵袭。他们也是一副自矜的派头，颇能惑众，引起张芝的反感，所以自称“下方罗、赵有余”，这样说，就有与人争胜的味道了。

汉魏时，士族名士间流行臧否人物的风气，他们的品评，重节操，论才性。文学之士陶染其间，则以己之所长贬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谓的“文人相轻”，就是概括这种现象。张芝轻视罗、赵，大概是书家之间“相轻”的先例。

张芝有一众弟子，其中韦诞（仲将）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书、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所谓“尤精题署”。洛阳、许、邺三都所建宫观，朝廷皆令韦诞题署。韦诞也是一位自矜能书的书家，声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的自矜自美，类似蔡邕，不针对别人。

西晋草书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种方式。他的草书，“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虺尾’。”（王僧虔《论书》）索靖称自己的草书“银钩虺尾”，很像为自己做书法广告。

东晋时代，自矜而争胜的风气更盛。王羲之书法原不及小他数岁的庾翼，四十岁之后书名大盛的时候，连庾翼家的子弟也学王羲之，庾翼时任荆州刺史，出镇在外，知道后很不高兴，修书都下：“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谢安也很看重自己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谢安曾经抄写嵇康的诗送给献之。后来献之渐有书名，为人所好，但是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显示自己的名士风度。东晋末年，桓玄权倾一时，喜好收藏“二

王”父子书法，他自矜其书的方式是“自比右军”。

争胜的典型，当推羲献父子。王献之曾经作笺十许纸与简文帝，后题“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是自美的例子。后来他连父亲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曾经问献之：“你的字与右军相比，你觉得何如？”他答道：“当然是我比他强。”谢安婉转反驳：“别人可不是这样认为。”子敬一步不让：“世人哪里能知道！”

王献之说自己胜过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时人很难认同。但5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献之的书名确实掩盖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说的那样：“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唐朝书论家特别欣赏王献之的行草书，李嗣真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书品后》）北宋米芾喜好王献之书法，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书史》）。

王献之是与父亲争胜，王羲之争胜的对象则是汉晋书家顶礼膜拜的张芝和钟繇，他自夸的口气要比王献之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王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

张芝以草书称圣。钟繇擅长铭石的隶书，抄写奏章的楷书，通尺牍的行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王羲之每每说自己“抗行”钟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张芝，是承认自己后于张芝，但羲之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这样攀比“钟张”，看似分别相比，实是夸耀自己兼具两位书法巨子之长。羲之的争胜自夸之言，成为南朝人评说右军的依据，庾肩吾《书

品》推崇右军“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无非是显示洒脱的名士做派，以高声价，只有著名书家才玩得起这样自信的游戏。到了南朝，竟然发生帝王与士族书家王僧虔“赌书”争第一的场面，就显得滑稽可笑了。

## 曹魏五家

汉魏之际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建安七子”、“正始名士”，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的“精神气候”里，文字书写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书迹不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文字形态，而且是文士用以“寄兴”的手段，用来表现“风度”的凭借。于是，书写技艺自在的审美价值凸现出来了，以“善书”而获致声名的书家群体迅速壮大起来。

所谓“曹魏”，时间上可以向前延伸到东汉末年曹操当国时期。在这六十余年间活动的书家，都生于东汉，处于相同的历史环境和精神气候之中，只是生卒或早或晚而已。因为发生了曹魏代汉的历史事件，改了国号，而且后人习惯以朝代次序书家，所以，那时一些年龄相近的书家被强行分离：在魏国建立以前去世者，便归入东汉书家；活到魏国时代者，则被视为曹魏书家。因此，曹魏第一代书家，也就是魏国建立之后还在世的东汉书家。

曹魏书家群中，著名人物是哪几位？这么一问，颇费思量。我想，与其重新排位挑选，不如尊重古人的意见。《三国志·管宁传》里就有现成的名单：

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

迹，动见楷模。

这五家就是魏国书法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妨因袭汉魏人好取徽号的习俗，名曰“曹魏五家”。

### 邯鄲淳（？—225？）

邯鄲淳是陈留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很看重他。《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记载了他的事迹：

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文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时五官将（曹丕）博延英儒，亦夙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曹）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侑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

邯鄲淳首先是文字学家，他“博闻古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江式《论书表》）。他也是书家，擅

长古文（当时俗称“蝌蚪书”）、虫篆，师法李斯和曹喜。据说“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古文之书由此得以复兴。邯郸淳兼通字学与书法，按古代的观念，他是正统书家，曾经“以书教诸皇子”。邯郸淳还能隶书，说是“得（王）次仲法”，但是他的隶书名望不及梁鹄。

### 卫觳（155?—229）

卫觳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三国志·卫觳传》说他“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卫觳是邯郸淳的学生，他的孙子卫恒曾经夸耀：“敬侯（卫觳）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卫觳的影响很大，其子卫瓘、孙卫恒，西晋时俱传古篆之法。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传授字学和古篆之法的陈留江氏、清河崔氏，都受学于卫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及其他书门的古篆，估计也是传自卫氏。两晋南北朝时期，卫觳的地位，相当于文字学与古篆之法的祖师爷。

卫恒说，正始年间刻立的《三字石经》，其中古文一体已经“转失淳法”。那时，邯郸淳、卫觳都已谢世十余年，而卫恒对石经的古文取批评的态度，也不可能是传邯郸淳古文的卫氏书家所写。

### 韦诞（179—253）

韦诞字仲将，京兆杜林人，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于家”（《三国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韦诞“诸书并善”，其官运亨通乃得益于书法。太和（227—232）年间，他“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四体书势·篆书序》）。韦诞“伏膺于张芝，兼邯郸淳之法”（《书断·中·韦诞传》），是他开始尊称张芝为“草圣”。

韦诞“尤精题署”，即擅长大字榜书。因为有这手技艺，所以吃过一次“高空作业”的苦头。《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卫恒《四体书势》说：“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绳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今本《四体书势》没有此段文字。）这个“故事”在南朝流传甚广，虞龢《论书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张怀瓘《书断》都有记载。

他有一则论书的篇章流传下来，后人名为《奏题署》，文曰：“蔡邕自矜能书，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径〕丈之势，方寸千言。”（《书断·中·韦诞传》）

邯郸淳与卫颀、韦诞三家，邯郸淳、卫颀有名在前，韦诞在后。卫颀与韦诞相比，韦诞更像一个文士，卫颀则是一个学者。他们擅长的书体是古文、篆书，与文字学有密切的关系，都是以古体见称的书法家。

### 钟繇（151—230）

钟繇字元常，颍川人。东汉末年，他在天子身边任黄门侍郎，曹操与袁绍的争战中，他为曹操提供过军援，曹操把他比作萧何。曹操封为魏王，委他为相国。曹丕代汉，他历任太尉、太傅，人称“钟太傅”。钟繇是名声赫赫的大书法家，奇怪的是，《三国志》本传中对他的书法竟只字未提。南朝人说他擅长的书体有三种：“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用现在的书体概念说，他擅长的是八分隶书、楷书、行书。

有关钟繇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

“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钟繇的师承，唐朝张怀瓘《书断·中》提到“师曹喜、蔡邕、刘德昇”三人。如果将钟繇擅长的书体与他的师承对应起来，他的八分师法蔡邕，行书师事刘德昇，篆书师承曹喜。人们很少提及钟繇的篆书，大概篆书不是他的特长。后人惟独没有说及他的楷书师承所在，大概楷书的整理与传扬自钟繇始，所以他有一个“正书之祖”的称号，世人奉他为楷书的祖师爷。

钟繇的书法，现在还能见到楷书奏表、行书尺牍十余通，但只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较为可靠。他写楷书还用翻笔，横向的笔画长，纵向的笔画短，字形横宽，还有隶书的遗韵。梁武帝特别推崇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神机”，“子敬不逮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梁朝书论家评价：“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庾肩吾《书品》）。

### 胡昭（162—250）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汉魏之际，他先后拒绝袁绍、曹操的征召，终生“养志不仕”，“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人称“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夷皓，伯夷和商山四皓的合称。汉末，胡昭“避地冀州”时，“幽州刺史杜恕尝过昭所居草庐之中，言事论理，辞意谦敬，恕甚重之”（《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杜恕是当时名家，善草书。韦诞也很敬重胡昭，魏正始（240—248）年间，朝廷大臣递相推荐胡昭入朝，将访于本州评议，韦诞认为胡昭是“宿得耆艾”，“诚宜嘉异”，反对以“考行于乡”的常规对待胡昭。

《三国志》记载“胡昭善史书”。他与钟繇同郡，行书皆师法刘德昇，有同门之谊，所以两晋南朝的书论家常常将他与钟繇相提并论。但是卫恒说钟、胡的行书“各有其巧”，又说“钟氏小异”刘德昇，则胡昭行